

實用主義與美國精神

◎ 符邊吉

Louis Menand, *The Metaphysical Club: A Story of Ideas in America* (New York: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2001).

1919年春天，胡適以「實驗主義」為題公開講演，扼要介紹了實用主義哲學家裴爾斯（Charles S. Pierce）、詹姆士（William James）、杜威（John Dewey）的思想。同年5月，杜威應邀到中國講學，影響當時乃至其後數十年的中國知識界甚巨，實用主義算是初次引進中國。至新中國成立，由於冷戰意識形態的差異，這個源於美國的舶來思潮自然被定性為「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現代資產階級反動哲學」、「是先進的科學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敵人」，而50、60年代中共猛烈批判胡適、杜威，實用主義自是劫數難逃。耐人尋味的是，幾乎同一時間，這個與美國文化劃上等號的思潮在本土亦遭見棄。當時主流的意見領袖如馬丁路德金（Martin Luther King）、尼布爾（Reinhold Niebuhr）等人鼓吹的思想莫不與實用主義相左。由此，不禁使人生出疑問：曾經是美國精神核心的實用主義，緣何在意識形態截然相背的國度，卻遭逢相同的命運？是巧合抑或別有玄機？

普立茲獎（Pulitzer Prize）這個備受關注的獎項相當美國化，不單規定候選者必須是美國公民，就連參選作品所報導或探討的主題背景也必須跟美國有關。在今年4月份公布的得獎名單中，紐約城市大學文學教授（Louis Menand）憑《形而上學俱樂部》（*The Metaphysical Club: A Story of Ideas in America*）奪取非新聞類的歷史著作獎，似可稍解這個疑團。

孟能在一次訪談中談到，該書是在冷戰剛結束的1989年開始構想與寫作的。當時困擾他的一個問題是：這個一度被奉為美國心智成熟表現的思潮，為甚麼在冷戰時期被喝倒彩，乃至突然從美國人的生活中隱退？然而，更令人不解的是，它在冷戰後為甚麼又迅即重新被熾熱討論？正是帶著這樣的問題，孟能為讀者繪測美國自南北戰爭迄今百多年來的心靈地圖。正如作者所說，他無意把實用主義化約為哲學史上的一個小環節，而是將之視為與整個美國知識份子文化發展相關的重要運動。因此，讀者看到的並不是抽象、細碎的哲學辯難，而是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兩代美國知識界領頭人——最高法院法官賀姆斯（Oliver Wendell Holmes, Jr.）、邏輯學家裴爾斯、心理學家詹姆士、哲學與教育學家杜威——的具體生活行跡，藉還原實用主義思潮發展的脈絡，重描其與美國文化氛圍轉變的關係。孟能的一個基本判斷是，這幾位思想家及與之相連的知識群體，大大改變了美國人對民主、自由、正義、容忍等價值的思維方式。

孟能的故事是從這樣的場景開始的。1872年1月，麻省康橋的年輕學人賀姆斯、詹姆士、裴爾斯及維慈（Chauncy Wright）組織了一個名為「形而上學俱樂部」的沙龍，聚集了當時以哈佛大學為中心的一群知識份子。按裴爾斯的追述，之所以取這樣的名字，多少是要諷刺、挑釁當時流行的德國唯心哲學（在美國以哈里斯[William Torrey Harris]的黑格爾學派及魯一

士[Josiah Joyce]的絕對觀念論為代表)。這幫年輕人一般相約晚上八點半在賀姆斯家裏碰面，通常先喝點朗姆酒，然後天南地北無所不談，有時還會為嚴肅的學術、人生問題爭得面紅耳赤。這個沙龍壽命不長，僅維持八個月便結束，但圍繞「形而上學俱樂部」的知識份子及他們在不同領域所開展的活動，為此後美國思想的改造與再生提供了沃土。孟能指出，實用主義者的知識立場其實跟十九世紀的兩起事件不能割離。其一關乎政治：1860年南北戰爭；另一涉及思想：1859年達爾文(Charles Darwin)《物種始源》(*On the Origin of Species*)出版。

對那一輩知識份子來說，南北戰爭的經歷無疑是深刻的。眾所周知，這場內戰是美國歷史的分水嶺。就政治言，北方勝利結束國家的分裂局面，保存立國以來的政體，也捍衛了神聖的民主理念；就經濟言，全國稅制建立，國家貨幣發行，橫貫大陸的鐵路通車，公立大學創立等等，都大大加速美國邁向現代化的步伐。然而，我們也應該看到，在種種生機勃發的表象下，內戰為那些倖存者烙下不能磨滅的創傷記憶。血淋淋的殺戮與恐怖景象遠超想像所能及，在在撼動了人們固有的價值體系。孟能指出，由於嚐受了因理念衝突而生的戰爭苦果，催迫著像賀姆斯、裴爾斯、詹姆士及其後的杜威等兩代知識份子，不得不探求一種全新的、非教條的理念或思考方式，用以適應急遽變化的現代政治與社會生活。

對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思想家而言，達爾文的學說強化了他們既有的對物種、種族本質特徵的信念，亦為懷抱於胸的歷史進步觀及宇宙決定論找到理論憑據。然而，當這種思想漂洋過海，抵達大西洋彼岸時，卻產生了另一種完全相反的效用：首先，實用主義者認為，達爾文理論的寶貴之處是它強調機遇、重視變化，由此崩毀了任何帶有目的論色彩的想法。再次，按達爾文的觀點，物種無所謂好壞，端看它能否適應特定環境。他們據此認為，人類的信仰及社會亦復如此。

實用主義兩代知識份子的出身、經歷縱或不同，但由於他們的思想都受胎自上述兩端，因此表現出相同取向，那就是相信觀念既非存在於烏有之鄉，亦非按自身的內在邏輯自生自發，而是有待具體的人與環境的創造。他們認為，觀念的存在價值只是為了在特定情境中回應特定的問題，它們的存廢繫於適應性而不在於不變性。簡言之，觀念不能脫離產生它的社會土壤而獨存。在詹姆士給杜威的信函中，曾簡要地闡述了這種新的哲學觀：「『實用主義』……的基本觀念：即這宇宙是個開放的宇宙，其中融合了『不確定性』、選擇、假說、新奇事物及種種可能……。」可以說，如果內戰前的人所擁抱的是一種「必然性」哲學，那麼詹姆士等人便將之改寫為一種「可能性」哲學。孟能據此認為，實用主義的思想底色其實是一種懷疑主義(skepticism)，只有這樣一種懷疑主義能使資本主義暢行無礙，也讓人較易適應、融入異質的、工業化的、大眾市場的社會。

正是這種新穎的思想取態，使二十世紀前半期的美國生活都籠罩在實用主義的氣氛中。事實上，如亞當斯(Jane Addams)這些二十世紀初的社會改革者的許多政策，很大程度受益於實用主義思想家當時對罪案、貧窮等社會問題的言論；1919年最高法院大法官賀姆斯對Abrams v. United States一案的異議，強調言論自由不單是個人的權利，更是創設自由社會不可或缺的善，為多元、容忍的理想社會樹立典範；至於杜威的教育理念對美國教育制度的影響就更不用贅言了。

然而，曾經輝煌的實用主義思潮並未長留人心。這又把我們帶回到原初的問題：它為何在冷戰時代突然從思想舞台中消失？一個粗淺的解釋是美國知識氛圍的改變。首先，賀姆斯提倡的現實主義法學(Legal Realism)在20、30年代被大幅修訂，後繼者轉而強調政治偏向的法

學理論，並成為當時法學界的主流，與賀姆斯反對司法激進主義的精神漸行漸遠；其次，在大學的講壇上，詹姆士、裴爾斯的思想日漸被其他哲學思潮取代，削弱了他們的影響力；再次，杜威倡導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理論則被批評為缺乏紀律與不夠嚴厲。……這些說法無疑有一定說服力，卻並不是答案的全部。孟能認為，實用主義之所以衰落，關鍵在於它的精神氣質與冷戰的指導思想相違。他指出，賀姆斯、詹姆士、裴爾斯及杜威等人從內戰汲取的重要教訓有二：一是避免將某種觀念、信仰奉為唯一的普遍原則；二是強調容忍。而與這兩點相親和的政治設計無疑就是民主制度。在這種制度下，不單只有那些正確的人才有機會說話，亦為少數異見份子提供說話的權利。然而，冷戰時期並不需要這些。在軍事上，它只信奉強力的戰爭原則；在思想上，它只容許人們在非此即彼的兩種意識形態之間作選擇。可以想見，實用主義主張折衷調和、反對抗爭衝突、標舉多元自由的思想風格自然無法在思想市場上找到買主。

1872年似乎離我們太遠，實用主義受歡迎的程度亦不復當年，可是，那一批康橋年輕學人留下來的精神遺產以及他們曾思索的問題，今天仍以不同方式在學術與政治兩界延續。

《二十一世紀》(<http://www.cuhk.edu.hk/ics/21c>) 《二十一世紀》2002年10月號總第七十三期

© 香港中文大學

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，如欲轉載、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，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。